

Tiaoz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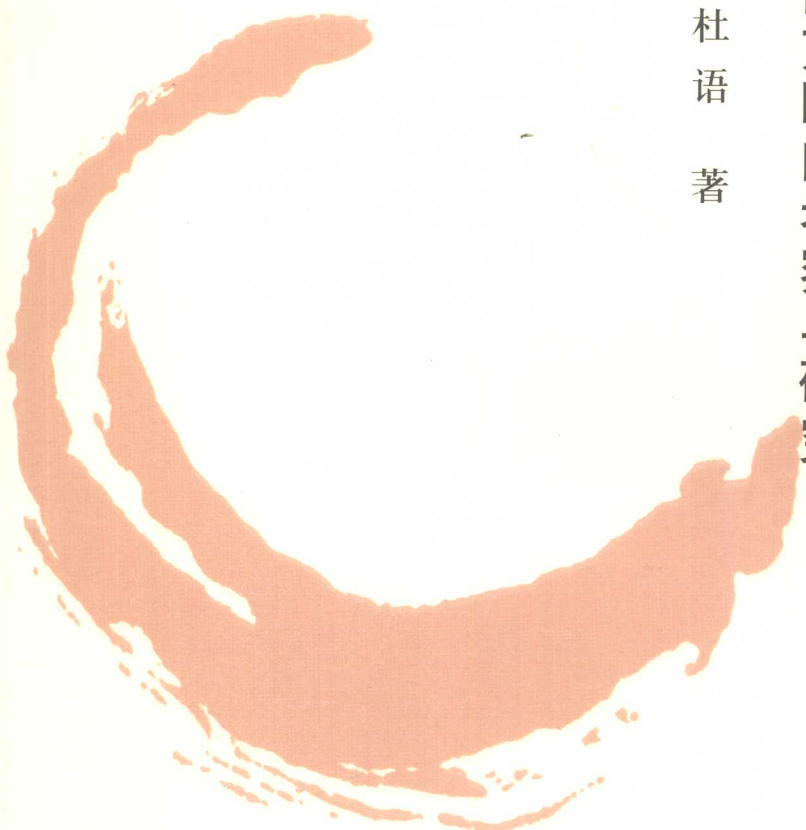
Qianian Bianju

挑战千年变局

对近代中国领袖人物救国方略的考察与研究

■ 杜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iaozhan
Qianmian

挑战

对
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挑战千年变局：对近代中国领袖人物救国方略的考察与研究 / 杜语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 - 7 - 5004 - 8551 - 3

I. ①挑… II. ①杜… III. ①领袖 - 人物研究 - 中国 - 近代②中国 - 近代史 - 研究 IV. ①K827 = 5②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7197 号

责任编辑 王半牧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53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和千年未遇的巨大变局。康有为1898年4月在京师保国会的演说中，曾把这种危机和变局描绘得淋漓尽致。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十二朝未有之奇变。”面对如此紧迫的民族危机和千年变局，“救亡图存”成了中国人的首要任务，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时代呼唤领袖，危机激起救亡。近代时期，中国的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中的爱国有识之士，尤其是其中的精英和领袖人物，纷纷提出自己的救国方略，探索挽救和振兴中华民族的道路和方法。所谓“方略”，按《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就是全盘的计划和策略。那么，“救国方略”就是指带有全局性的挽救和振兴中国的方针、策略、计划、方案。近代以来，从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魏源，到洋务运动时期的曾国藩、李鸿章，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直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等精英、领袖人物，无不提出了自己的救国方略。这些救国方略是中华民族一笔深厚丰富的历史遗产和资源，认真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无疑对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我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已近半个世纪，深切感到应该好好梳理和总结这笔丰厚的历史遗产。

有一天，我过去的学生，担任线装书局编辑室主任的杜语来看我。他带来了一大摞沉甸甸的书稿，翻开一看，题目竟然就是《挑战千年变局——对近代中国领袖人物救国方略的考察和研究》，这不正是我多年思考和想做的课题吗！原来杜语这些年来一直在为此孜孜不倦，苦苦求索。他在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我曾教过他们班的中国近代史，当过他们的班主任。当时就觉得他是个勤学好思的学生。大学毕业后，他曾在河南郑州大学任教。1989年又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近代中国人的英国观》的硕士论文。硕士毕业后又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的博士研究生，完

成了《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的博士论文。博士毕业后又到人民出版社、中国改革报、线装书局等新闻出版单位工作，增添了许多社会阅历。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始终不忘史学研究，博览群书，深入思考，勤奋写作，终于完成了这部洋洋40余万字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杜语试图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对近代救国方略作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梳理。对从鸦片战争时期经世致用派到太平天国农民领袖、洋务派地方督抚、维新派知识精英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的各种各样救国方略，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理性的思考和比较客观、辩证的归纳、总结。他阅读了大量史料、原著，同时吸收参考了许多前人的研究成果，然后经过自己的思考、分析、考证加以论述。有的观点颇有独到之处，有的看法则提出与前人商榷。当然，学术研究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要力求言之有理，能自圆其说。因此，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杜语的一家之言，很多内容只是他对近代救国方略的初步探索和研究，有些论点和论述不见得很成熟和完善，甚至有些观点我也不完全赞同，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但是该书毕竟是提供了对这一课题的初步探索成果，对历史研究和现实决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我也希望他能以此为基础，继续努力，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特别是救国方略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作出更加全面、深刻的论述。在文字表述上也进一步加工和推敲。力争学术水平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加出色的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晓秋

2009年11月24日

于北京蓝旗营史海遨游斋

序 二

杜博士以“千年变局”为研究主题，的确有些“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意味，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因为在刚刚经历过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的冲撞以及好莱坞影片《2012》的震撼之后，尤其是全球经济仍然身处风雨飘摇的大变局之时，去触摸伤愈不久的疤痕，去回顾不堪回首的往事，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和真诚，更需要大格局和大智慧。

遥想当年李鸿章为把大清王朝这艘破船打造成驶向新生的诺亚方舟，以破解“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终也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千古是非输蝶梦，到头难与运相争”，眼睁睁地看着数千年来威震四海的泱泱“中华帝国”，被西方列强的工业文明逼到一隅被迫做出“生存还是死亡”的选择题。

如今，这场变局的谜底已然昭然若揭，没有了悬念，所谓“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然而，回望历史，既依稀可见古老的帝国被山崩海啸所吞噬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也仿佛能够听到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们高举“救国存亡”的大旗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阵阵吼声，又能够清晰地看到朗朗乾坤、红旗飘飘之中一幅幅交相生辉而又激动人心的大地震、神舟飞船、奥运和大阅兵的长卷……

因此，如何能够站在“大历史”的视角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立场上，把帝国兴衰、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作为鲜活的样本，从而汲取丰厚的精神养分，以丰富人类的智慧资产库，这不啻为了一件充满挑战和乐趣的事情。显然，杜博士是乐于迎接挑战的。这倒不仅是因为他师从历史大家刘大年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最杰出的博士之一，也不仅是因为他学贯中西、又通文史哲与财经，而是因为他独辟蹊径、选择了特色鲜明的切入点——正如本书的导论所指出的：“从古代的英雄谋略到近代的领袖方略”。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在书中重点研究与考察这些在近代中国面临千年未遇之变局及其转化过程中，成长出来的这些领袖人物及其救国方略的谋划、实施，考察与研究在这一谋划、实施的过程中近代中国政治智慧、革命智慧的觉醒与成长。”换言之，作者是力求“在更高的境界窥破历史的真相”，亦即“近代中国领袖人物救国方略的真相”。

其实，早在几年前，杜博士即出版过一本有趣的书《英雄论英雄》，以着手探讨“创造中国历史的阳谋大师及其成功实践与谋略”，以期从中国古代文化最广泛应用的阴阳概念入手，深入谋略核心把握住了谋略最本质的属性——伦理性，然后从这一点进行突破。我与杜博士曾经一起为中国疾控中心的管理者以及各国际合作项目的主管们进行管理培训，那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我们坐在当年康熙大战葛尔丹的草原上，听杜博士为我们解读大清王朝的兴衰；我们在避暑山庄里探寻近代中国“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起点，以及一唱三叹的“救亡与启蒙”主旋律的源头。期间，杜兄向我谈到他的构想，我感觉到他已经着手进行从“英雄谋略”到“领袖方略”的架构设计了。

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杜兄作为一个老北大人，担任北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以来，一直致力于西方“领导学”、“政治学”与中国“英雄谋略”、“领袖方略”的综合研究与教学工作；他那颗聪慧的头脑仿佛总是充满创意，各种火花一触即发，而且他说话时很有激情，一览无余地表露出他的率直与真诚，中心的同仁们往往喜欢与他一起讨论问题。为了丰富自己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杜兄又将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从事研究工作，以求完成融通东西学识与智慧的“领袖学”或“领袖方略”的开创性工作。

作为老友，由衷地为他所做的一切鼓之舞之，同时，更期待与他一起分享“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乐趣。

北京大学质量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
美国克劳士比（中国）学院创始院长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wo characters, '杨' and '钧',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09年12月29日

目 录

导论 从古代的英雄谋略到近代的领袖方略	(1)
第一章 清朝地方督抚领袖的救国方略	(30)
一、闭关锁国与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方略	(30)
二、开眼看世界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方略	(40)
第二章 太平天国农民领袖的救国方略	(61)
一、借助洋上帝发动农民革命的方略	(61)
二、建立地上天国拯救国家民族的方略	(69)
三、从追求平等到发展资本主义的方略	(79)
第三章 洋务派领袖的救国方略	(85)
一、凝聚传统，内圣外王的方略	(85)
二、捍卫名教，完成功业实践的方略	(90)
三、寻访英贤，造就人才群体的方略	(109)
第四章 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的救国方略	(133)
一、托古改制，发动维新运动的方略	(133)
二、君主立宪，推进维新变法的方略	(146)
三、开办学堂，培养维新骨干的方略	(159)
四、组织学会，形成维新中坚的方略	(164)
五、创办报纸，运用维新舆论的方略	(170)
六、大同世界，构建维新最高纲领的方略	(181)
七、定为工国，实业救国的方略	(193)
第五章 思想文化界领袖的救国方略	(202)
一、以英国为师的方略	(202)
二、全盘西化的方略	(219)
三、教育救国的方略	(234)
第六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的救国方略	(242)
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方略	(242)
二、“创立民国”“权能分治”的民权革命方略	(256)
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民生革命方略	(265)

四、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以领袖取代帝王的政党 革命方略	(276)
第七章 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救国方略	(305)
一、建立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方略	(305)
二、走井冈山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略	(316)
三、把握三大法宝，奠定民族复兴基石的方略	(331)
四、阐发新民主主义论，确立中国革命阶段发展的方略	(347)
第八章 对近代中国八个关键性的救国方略的总结	(375)
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掌控强弱关系的最初辩证法	(376)
二、“建立地上天国”——用西方的宗教形式表现中国农民 革命斗争的内容	(377)
三、“内圣外王”——凝聚传统精神，创造现实功业	(378)
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徘徊在十字路口的艰难 抉择	(380)
五、“托古改制”——撬动政治变革的有力杠杆	(381)
六、“资产阶级革命”——中国近代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 革命	(382)
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革命成功的核聚变	(383)
八、“用理论武装民众”——实现整个民族的全面觉醒和 解放	(384)
主要征引书目（未征引的参考书目未列入）	(387)
一、经典著作	(387)
二、资料	(387)
三、著述	(393)
四、论文（一）	(398)
五、论文（二）	(399)
后记	(401)

导论 从古代的英雄谋略到 近代的领袖方略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是唯一有着完整延续的文明体系。这样一个体系，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和它传承不绝的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的。所谓厚德载物，君子以自强不息，都是试图去说明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的。此外，悠悠五千年先人创设的各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也都在各个方面强化着中华文明的血肉之躯，使中华文明与当时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相比，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享有着举世瞩目的盛誉。对此，不仅得到了在中华文明繁盛时来中国旅行的外国游客如马可·波罗的盛赞，就是随第一个赴华使团——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使团运送礼品总管约翰·巴罗也在它的访华游记——《我看乾隆盛世》一书中承认：“相比欧洲的大多数国家，连希腊都不例外，中国更早地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文明。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虽然巴罗不敢肯定“她是否像传教士所说假定的那样一直在进步，仍然可以跟许多现在的欧洲国家相抗衡”，但他确信：“从16世纪到16世纪末，跟欧洲的一般状况相比，她占有绝对优势；如果不是在科学上，至少在艺术和制造业、在生活的便利和奢华方面是如此。这一时期中国的状况跟目前的基本相同，而且可能还将延续下去。”^①就是当代西方的学者对此也都是认可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就指出：“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000万—5500万人），有灿烂的文化，有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联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孔学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来者羡慕不已。”^②

① [英] 约翰·巴罗著，李国庆，欧阳少春译：《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② [美] 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但令后人们遗憾的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这些昔日辉煌就只能像落日的余晖，给愁云惨淡的东方时空涂抹些令人心碎的金黄，而不能一旦冲破乌云，重新把温暖普照大地的万民之心灵。中华文明造就出来的内圣外王式的东方圣哲和君王也再不能从他们祖先的武库中寻找立竿见影，药到病除的武器了。他们只有陷入深深的思考和茫然之中。他们也有过清醒，那就是他们已从血的教训中明白，中华文明已不是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了，中华帝国更是遇到了千古以来未有之奇变，千古以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认为是三千年未有之奇变，康有为则认为是中国四千年来之变局，亦祖宗二百年来所未遇也）；中华帝国也早已不是令人不敢窥视的天朝上国了，他们需要寻找新的武器来拯救他们的国家。不过，此时，他们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协助君权神授的皇上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了，任务已发生了质变，从治国到救国了。这就是近代和古代的本质不同，这回是遇到了真正的危机，遇到了不是以往古代的传统思想、谋略、方略所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摆在了近代中国的领袖人物们面前，他们显然需要新的武器、新的思想、新的谋略和方略来挑战这迎面而来的千年变局。

关于方略，大概最早使用的是战国大学者荀子。他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一句就用到方略一词。汉代以后，这个词就用的很普遍了。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汉书·赵充国传》都有使用。其义是指治国的方针、策略、谋略、计划，等等。《辞海》的解释是“方策，谋略”。并引《晋书·王濬传》“濬设方略，悉诛弘等”。又引孔戣《谢赐手诏状》：“乏御侮之筹谋，罕济时之方略。”^①而“方策”，《辞海》的解释是“典籍”，《辞海》引的原典是《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②一句。对此句的解释，则是引的郑玄注：“方，版也；策，简也。”^③至于“谋略”，《辞海》的解释是：“计谋策略。”所引原典是《三国志·吴志·陆逊传评》：“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④道光帝也说过：“方，道也，略，法也。出谋发虑，决策制胜，明炳彪于几先，智周乎万里，而总不离乎道；法乃足以彰声讨而殄丑虏也。”^⑤总之，是有两个主

① 夏征农主编：《辞海·语词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393页。

⑤ 道光皇帝《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序》，见沈元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十六辑，851，曹振鏞等纂《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首，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年影印本。

要内容，一个是理性成分主导的“方策”，一个是个性化成分主导的“谋略”，而且，依道光帝的解释，还已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含义，是一个涵盖面很大的一个词汇。姚继荣在其《清代方略研究》的博士论文中更是详细考证方略一词的含义，认为方略除其本义外，还有引申义如“对付”、“应付”和“收拾”、“指挥”、“处置”的含义。此外，方略在宋代还有“方略吏”的官名，大约相当于后世的“师爷”之类。而且，至少从宋代起，“方略”一词已经与军事战争的书籍有关了，但大多指讲述战略、战术之类的兵书，还不是叙述战争过程的专史。指专史则是在清代出现的现象，清代往往以“方略”特指官修的纪事本末体本朝战争史，以强调皇帝对战争的方针、用兵的战略策略的正确、英明；但同时，也仍保留了宋代以来指兵书的惯常用法。^① 清朝的康熙、乾隆两皇帝尤其喜欢使用方略一词，为了记述、光大其丰功伟绩，康熙、乾隆皇帝还为此设立了隶属于军机处的方略馆。方略馆的职掌就是编纂清廷重大军事行动的始末，但方略馆并不是一个常设的机构，而是每当有重大军事行动时才在得胜后设立。^② 清廷自设方略馆后，前后编纂了二十五种方略。^③ 编纂方法是“将有关该次战争的奏折、上谕按日汇编，备祥原委”^④，其名有时称纪略，有时称方略，如康熙时大学士勒德洪所撰《平定三逆方略》、《平定察哈尔方略》以及内阁、翰林院集体撰修的《平定海寇方略》、《平定朔漠方略》、《平定罗刹方略》等，道光时大学士曹振鏞等纂《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等纂的《剿平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乾隆时方略馆署名编的《钦定巴勒布纪略》，《钦定廓尔喀纪略》，等等。因此，本书认为，联系到近代中国的情况，方略一词实际上已成为谋略、方策、策略、战略、政略等等一系列词汇的一个总的代表性用语。但这不等于方略可以完全取代以上词汇，以上词汇自己特定的内涵

① 姚继荣：《清代方略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未刊稿，第2页。

② 姚继荣认为康熙时所编纂的各种“方略”类书都是以大学士、内阁学士等为主体的，康熙时也建有编“方略”的馆，但不是专门的方略馆。而是以某方略命名的馆，如平定三逆方略馆等，专门的方略馆是乾隆十四年（1749）由大学士来保等人奉敕编纂《平定金川方略》，诏准后才于隆武门外、武英殿后、咸安宫左设立，隶属于军机处，还拨给房屋三间，以为该馆专用。至此，所谓方略馆遂成常设机构，宣统三年（1911），因责任内阁取代了旧内阁和军机处，方略馆才被裁撤。终清之世，方略馆共编纂了20部各类“方略”。参见姚继荣《清代方略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未刊稿，第7页。这样说来，那些署名不是方略馆，而是大学士的方略，其实，也是方略馆作为主体负责修纂的。

③ 参见姚继荣《清代方略研究·清代方略一览表》，西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

④ （清）方略馆编，季垣垣注：《钦定巴勒布纪略·前言》，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

和外延还都存在，如谋略是个性化的灵机应变式的，方策是具体的做事方法，个性化较少，固定的计划性较多，策略则是进一步理性化了，但策略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的是具体的问题，至于全局性的问题，则需要政略和战略来解决。政略是政治方面的大略，战略是军事方面的大略。政略和战略都是较少个性化的，更多程序化的，固定化的，一旦制定，就不易变更，这一点和谋略不同，谋略是最变动不羁的，而且也是应用面更广的。而在应用范围上，政略专指政治，战略专指军事，后来政略则很少有人使用，一般都使用战略来指代。战略一词因而有所泛化，甚至极大地泛化，除指军事之外，也开始指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甚至技术、心理，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但尽管如此，战略这个词的表现范围还是有其特定领域的，战略的特定领域不在于它表述、包含的广阔性，而在于，战略是有强烈的博弈目的性的，而方策、策略、政略、谋略的博弈成分就淡薄一些，它们更多的是体现一种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智慧，这种智慧既可以用来博弈，也可以是和平主义的，审美的，甚至自娱自乐的，并不一定追求战胜对手的最终目的性。因此，战略在长时间还是比较特指军事方面，并不能完全替代政略一词所表现的内容，若出现要表达既是战略又是政略的内容时，就很难办。这样，方略一词就派上了用场。它被赋予表现更宽、更广、更大、更深、更博的内容任务，而如此一来，这个词就与普通人无缘了，因为普通人不可能有如此宽、广、深、博的内涵，所以，鉴于这个词如此辉煌，普通人不能用，顺理成章，就自然被皇帝看中，成为御用的词汇，专指皇帝的宏图大略了。而到了近代，方略一词也沿袭了其在古代所具有的神圣性，也绝非平民百姓所可得而使用。近代中国使用方略一词的一般是领袖级的人物，如孙中山就写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建国方略》等。当代，许多学者也是以方略作为题目来论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的路线、方针以及为达成这些路线、方针而采取的措施，也没有见过写平民百姓有何方略的。^①另外，在古代中国，虽然皇帝偏爱使用方略一词，但方略一词的理性成分还是占据次要地位，个性化的、灵感凸显的谋略内涵还是占据主要方面。而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客观真理、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越益正确、全面、深刻，人们，特别是领袖人物应对各种复杂问题、难题时的理性化、科学化程度也必然就愈益提高，甚至会达到马克思所期待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合二为一的境

^① 参见徐中《中国共产党的执行方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25页。书中列举了百余部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专著名录。

界,即:“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①而即使尚未达到如此高远神妙的境界,那在此过程中,个性化、艺术化的谋略成分居于次要地位也是理所当然。此时,方略一词的理性化内涵也必将越益明显地凸显出来,成为名实相符。而古代帝王虽然也使用这个词,但因为他们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较浅,其个性化、盲目化倾向还比较明显,故他们使用这个词就显得名实不符。或者说近代以来,人们已将这个词赋予了新的内涵。至于领袖一词则是一个纯粹的外来语,在中国古代是没有领袖这一概念的。领袖的外语直接对应的是 leader,复数形态是 leaders,现在也有翻译成领导者,^②在中国近代,还是西方人首先把领袖的桂冠戴在了中国的杰出人物头上的。如 1861 年,英国驻华参赞巴夏礼就称太平天国的天王为“这位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③,太平天国的支持者英国志士呤喇也称洪秀全为“中国的伟大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领袖”^④。并说:其歌颂太平天国革命的一本书是“遵照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领袖的嘱托而写的”^⑤。1905 年,法国驻华公使吕班(dubail)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8 页。

② 西方近代以来也有把领袖称作英雄的。如 19 世纪英国文坛巨擘卡莱尔就把历史上的领袖人物统称为英雄。他进而把这些英雄划分为“神明英雄”,“先知英雄”,“诗人英雄”,“教士英雄”,“文人英雄”,“帝王英雄”(见托马斯·卡莱尔著,周祖达译:《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但所赋予该词汇的含义与古代相比已有很大不同。

③ 罗尔纲、王庆成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47 页。

④ [英] 呤喇著,王维周、王元化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 页。

⑤ 同上书,第 1 页。但此处的领袖主要指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因呤喇在太平天国诸领袖中,他和忠王关系最近,并最佩服忠王,最怀念忠王。当然,他写作《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除了受太平天国领袖们的感召,想向世界宣传太平天国的“基督的、政治的、军事的和社会的组织;对于它的卓越领袖洪秀全及其他首领的翔实描述;革命运动的兴起、发展和现状;这个革命对于三万万六千万中国人民的幸福的关系和影响”(同上书,“序”)外,他还有“批判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包括英国对那些接受基督教、废除偶像崇拜、反抗清朝鞑靼政府的太平天国爱国志士的干涉和战争的目的”(同上书,“序”)。

也曾把广西会党的首领们称作会党领袖^①，差不多同时，日本驻孟买领事也把康有为称为“清国改革派领袖”^②。至于对孙中山，称其为领袖的就更多了，如法国驻蒙自领事就称，“根据这位改革派领袖的看法，我们已经确切地阐述了法国可以用怎样的方式为他的党提供参考”^③。不过名称的改变虽然表示内涵已有所不同，但作为领袖人物把救国的方针、政策、计划，以及实施方案称作方略的，还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将方略一词完成从帝王御用到政党和领袖专用的转变也还是从孙中山开始。而在孙中山之前，这个转变虽也一直在进行，但并没有全部完成。另外，近代以来因革命而高频率使用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词汇则大致属于政略的范畴，因此，也理应纳入方略所涵盖的范围。至于思想，虽不直接属于方略的范围，但思想和方略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甚至可以说是互为表里。^④

那么，领袖人物的方略又是怎样从古代的英雄谋略中转化而来的呢？要弄明白这一点，还要从近代中国所处的时代分析。本书所涉及这个时代，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衰世，但就世界范围来看，这个时代却正是世界发生着继号称轴心时代以来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伟大变革的时代。所谓轴心时代，这是德国哲学家与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1949年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现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⑤之所以称轴心，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大约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世界上一些主要的文明地区都不仅社会历史发生着巨大的革命性的剧变、突变，而且，在这一时期，人类对自己的认识也第一次达到了哲学的高度，并为此后两千年的人类思维划定了框架。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至今没有超出这一框架。但本书认为，如果这一结论是指工业革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是合适的，但自从工业革命

① 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② 同上书，第六卷，第109页。

③ 同上书，第七卷，第8页。

④ 俞诚之在讨论政略学与政策学二者的区别时，认为，“政略学者，研究政治手腕之实施之学问也；政策学者，研究主义上实质内容的实施之学问也”（见俞诚之《中国政略学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⑤ 但许多学者重视其理论，是因为他们认为其突破了西方中心论，肯定了中国的孔子与苏格拉底、佛陀和耶稣同为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创造者，同时又否定了近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时期是人类的第二个轴心时代，从而更把其非西方中心说推向了彻底之故。但本书并不赞成雅氏的这一理论推演，本书也不赞雅氏仅把近现代，乃至当代作为分析对象，在讨论此问题时，应该有前瞻性，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甚至全球化的前景，同时，不能过分拘泥于在时间跨度上与第一个轴心时代保持完全对等，时间可放宽一些。

为人类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自然科学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后，人类就已经实现了第二次伟大的飞跃。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更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人类对自己和自己的社会发展的认识提到了科学的高度，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则是在继承了工业革命后的人类思想成果，甚至整个人类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的更高级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思想武器，这就更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人类已实现了第二次飞跃。第一次，人类真正实现了从动物界脱离出来成为人，具有人的思维模式和高度；而第二次，人类基本上是从人的高度脱离出来，达到了神的高度，因为神就意味着改造自然、创造奇迹，而这些在人类的第一次飞跃时还远远没有达到，此时，人类还是匍匐在神的光芒下，基本上是顺应自然，这时虽也有创造和改造，但都不是化学性的，质变性的，而都是机械性的和物理性的。由此，我还联想到德国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尼采所喊出的“上帝死了，超人诞生了”的呐喊，这说明，人类中最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了人类已进入到一个超人时代，但当时，大多数人还都是把尼采的呐喊看成是他对超人出现以统治人类的极端期望，而没有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到，尼采是代表人类本能地、天才地预见到了人类自身已实现了他的第二次伟大飞跃，实现了从人到神的更为巨大的跃升和超越。但超人不是个人，而是正在发生的从人到神的质变的整个人类。因此，自第一次轴心时代以来，人类长期以来实际上是在积聚下一次变革或突进的力量，而这下一次无疑就是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突破了自第一次轴心时代的伟大变革以来，人类长达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停滞而达到了一个质变性的力量总爆发。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首先把西方卷入了这一伟大变革之中，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力量膨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向全球扩展其势力，这就必不可免地把数千年来在传统社会中自给自足的世界其他国家都卷入到了这一伟大的变革中，西方无疑是这次伟大变革的主动性力量。对此，学术界是有大量研究的。具体到中国近代史，曾到过中国看过中国清廷档案的美国人费正清就主张西方是为中国变革提供主要动力的最著名的西方学者。他的这一套理论被概括为冲击一回应说，并遭到了不少的误解和反对。反对者中最著名的也是西方人，更准确地说，也是美国人，名为柯文。柯文反对费正清这一观点的代表作为《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在该书中，柯文认为：“其实，这一画面的主要毛病，并不在于它是‘错误’的，而在于它没有把其思想所能概括的范围交代清楚。就像物理学领域，过去百年的发展尽

管没有推翻牛顿定律，但却表明这些定律适用的范围是有限度的，冲击一回应取向对晚清历史虽然可以说明某些问题，但并不能像上述诸例设想的那样足以说明全部问题。”^①又说：“简而言之，中国在前一个世纪对西方回应的这段经历，必然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尽管具有历史的重要性，但与西方冲击并无关联，或者关联甚少。另外一些事情则虽然直接或者间接受西方冲击的影响，但决不能把它们看成仅仅是（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主要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如果我们把‘回应’理解为有意识地去解决冲击所造成的新问题的话）”^②。但依本书看，柯文企图补救费正清的观点偏颇的出发点是对的，但其立论是错误的。首先，柯文把本应是双方共同作用发生的历史概括为中国中心观，而并未真正从中国的民族性格和中国民族文化方面来寻找，并未找到外力冲击和内部回应的中间点，这就使柯文偏向于一端并未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这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先生所指出的：“倘若有人以为那对立的两条主线，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必定使自己陷入泥坑里，无法自拔。说外国侵入中国不起决定作用，那等于说，中国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被压迫民族的。不会有人听信如此荒唐无稽之言！说中国内部力量不起决定作用，那等于说，中国的民族独立是外部侵略势力开恩赐予的，而不是中国人民战胜了所有强大敌手后所获得的。同样不会有人听信如此荒唐无稽之言！历史是一个过程。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中。静止观念，绝对观念，不可能认识历史。形势、条件变了，历史的面貌结局也就变了。”^③其次，费正清并未否定中国内部的力量对中国近代历史所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他只是强调，“19世纪和20世纪震撼世界的技术进步，和其他种种进步的策略和发明者都在西方。因此西方能从自身文明内部实现现代化”^④。而中国只能在西方的冲击下走向现代化。但他同时也强调“决定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因素并非外来，而是产生于中国社会内部”^⑤，只是“由于中国社会中存在着惰性力量，故西化进程只停留在表面，当外界压力增大时中国便暂时做出应付，危险过去后则依然放我，概而言之，中国

① [美]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页。

② 同上书，第8页。

③ 刘大年：《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组织处编《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④ [美] 费正清著，张京译：《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⑤ [美] 费正清、赖肖尔著，张沛等译：《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页。